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吉鸿昌



爱国主义丛书
吉鸿昌
继新 汤飏 编著

1995年10月18日，河南省扶沟县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纪念吉鸿昌诞辰一百周年大会。这次会议给每位参加会议的官员、专家、学者和亲友等发了一件纪念品。纪念品是一个小小的瓷杯，上书有吉鸿昌烈士的一句名言：“做官即不许发财”，包装上有吉鸿昌将军的遗墨“国魂”二字。受礼者的感慨殊深地说：“千里送鹅毛，礼轻仁义重”，有的说：干第二次革命，还必须牢记干第一次革命时广泛传颂的话：“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吉鸿昌一生表现出一个中国共产党人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伟大气概。

一、贫苦的农家子弟早成“龙”

吉鸿昌（1895—1934年），原名恒立，别号世五。1895年10月18日，吉鸿昌出生于河南省扶沟县吕潭镇的一个贫苦的农家。

父亲筠亭因家境贫穷，将仅有的十亩地也典押出去了。为了全家人的生计，他在镇上开了小茶馆。他还粗通医道，常为穷人看病，因而很受乡里尊重。筠亭性格豪爽，为人急公好义，从年轻时就对镇上的土豪劣绅不买帐，他的口头禅是“处世为人秉忠良”。镇上一些为富不仁的土豪劣绅视他为眼中钉，一次他们纠集了一帮人，带着凶器找上门来，想对他行凶。他在几个乡亲的帮助下连夜逃跑。

由于吕潭镇是贾鲁河上南通北达的商业中心，外界的消息和各种思潮很容易流传到这里。加之吉筠亭天性豁达，平日茶馆里来客川流不息，经常接触到一些南来北往的爱国志士，有时在一起交谈，他虚怀壮志，不知疲倦。经常耳濡目染，使他痛恨清朝廷的腐败，深感中日甲午之战战败之耻，因而具有强烈的反帝爱国主义思想，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他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做官即不许发财”、“不媚官长、不畏豪强、处世为人秉忠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等种种教诲，对幼年的吉鸿昌以至他的一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吉鸿昌六岁丧母。由于家庭的贫穷，他只能在劳动之余，到乡塾里旁听先生讲课，认了不少字，也能读一些书。他爱读历史书及民族英雄的故事。在夏季里，他常在院中的葫芦架下，向儿童和街坊邻居讲岳飞、文天祥、戚继光等民族英雄的故事，他经常是言词慷慨，情绪激动。

为了维持家庭生活，吉鸿昌很小就参加劳动，经常帮助父亲拾柴火、拣庄稼，提着篮上街卖烟丝，农活忙时还当上半拉子主角。稍长，就去帮助父亲照看茶馆，帮助父亲捉蝎子、做药膏、替穷苦乡亲治病。他从不向贫困低头，更不向仗势欺人的地主恶少俯首，看到地主恶少对穷人孩子寻衅欺凌，就挺身而出，打抱不平。吉鸿昌身上所特有的这种“人穷志不穷”、“人少志不小”的气质，幼年时代就常常受到乡邻的称道。

幼年时代的吉鸿昌，不但吃不饱饭，身上也少穿戴，冰天雪地，他还赤脚单袄，手脚龟裂。家乡那帮纨绔恶少，每逢看见鸿昌穿一身不蔽体的对襟棉袄，就要欺凌他。鸿昌性情刚烈，立即挺身狠斗，不到对方服输求饶，决不罢手。

1909年春，家里已难苦撑，吉鸿昌便离家到扶沟县城松盛楼首饰店做银匠学徒。他在这里过着非人的生活，劳动条件恶劣，他的双手因受腐蚀而鲜血直流。后因兵荒马乱，店铺倒闭而回家。

1911年，吉鸿昌又到离家一百多里路的周口镇增盛合杂货行当学徒，在这里苦熬了两年，受尽了老板的辱骂欺凌，看到了社会的黑暗，使他更加同情劳苦人民。

二、“扁担楞”和“吉大胆”

“扁担楞”和“吉大胆”都是吉鸿昌的绰号。

吉鸿昌，从小就是一个宁折不弯的硬骨头。人家用扁担打他，他就用臂挡。父亲也因他倔犟脾气，往往拿扁担追着打他。因此，人家给他送了一个外号“扁担楞”。

至于“吉大胆”这个外号，则是冯玉祥给他取的。为什么要给他取这个外号呢？这还得从吉鸿昌参加冯玉祥部队说起。

吉鸿昌离开周口镇增盛合杂货行后，便回到家里。一天，他向父亲表达了要当兵的愿望。父亲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因为鸿昌曾多次表示过：“大丈夫要不惜五尺血肉之躯，报效国家！”的壮志。1913年8月，吉鸿昌带着父亲从箱底拿出的一块银元离开了家乡，步行到郾城，准备投军。这时，冯玉祥正在郾城一带招兵。他挑选新兵比较严格，招募人员总要摸摸新兵手掌上有无老茧子，是否劳动阶层，品行端正。由于吉鸿昌身材魁梧，英姿威严，谈吐忠实厚诚，手掌上又有厚茧子，很快被招募人员选中了。从此吉鸿昌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那时，他还不满18岁。

吉鸿昌来到冯玉祥部队后，22岁就当上连长，以后升任营长、团长、旅长、师长，直至军长。冯玉祥信任他，喜欢他吃苦耐劳、作战勇敢、冲锋陷阵、奋不顾身、为人正直的精神品质。在冯玉祥面前，他有什么说什么，毫不顾忌。冯玉祥叫他“吉大胆”是对他的真实写照。

人们称冯玉祥为“基督将军”，这是因为他把基督教引进军队，要官兵入教，以此来维系军队。每当星期日，全体官兵都要集合听牧师宣讲教义。因而常常引起人们的非议，军队也易为帝国主义分子所利用控制。1914年夏，冯玉祥的军队在西安练兵。一天早晨，当冯玉祥在台上照例进行“每日朝会问答十条”时，当他问：“弟兄们，我们是谁的军队？”官兵应回答：“我们是老百姓的军队！”但这时突然有一青年士兵高声回答：“我们是洋人的军队！”冯玉祥及全体官兵都大吃一惊。这人不是别人，就是吉鸿昌。他被押到台前，仍然昂首挺胸，毫不屈服。冯玉祥问他：“我们是老百姓的军队，你为什么说是洋人的军队？”吉鸿昌回答：“听洋人的话，信洋人的教，替洋人打仗，受洋人的气，为啥不是洋人的军队？”冯又问他：“你这小子难道不怕洋人么？”他愤慨地答道：“我们都是中国人，干什么要怕洋人？我不怕，我用嘴啃也要把他啃倒。”此时，全场官兵都为他耽心，但冯玉祥却叫他归队，内心很喜欢他的闯劲。

1915年8月，冯玉祥的部队在四川南充驻防。一天，冯带着一些战士在嘉陵江边洗澡，有几个战士被水冲到深处，他们不会游泳，情况危急。当冯玉祥着急地问谁会游泳，快去抢救时，吉鸿昌一面答着：“我会水！”随即跳到江中。其实他根本不会游泳，很快也淹在水中，后被别人救了起来。冯玉祥认为他这种舍己救人的精神十分可嘉，夸奖他说：“你真是个吉大胆！”从此“吉大胆”的绰号便在军队中流传开了。

吉鸿昌在冯玉祥的军队里历经沙场征战，虽然战功辉煌，但他看见帝国

主义支持下的军阀混战连年不断，心情十分沉重，忧国忧民之心日增无减。

1924至1927年，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革命运动。这场革命运动声势之浩大，发动群众之广泛，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人们通称它为中国“大革命”。以推翻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为目标的大革命是一场民族民主的大革命。冯玉祥原是直系军阀吴佩孚的部属，他在大革命高潮的推动下开始倾向革命。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暗中酝酿倒戈反直，发动了“北京政变”。这时，吉鸿昌任第11师22旅43团的一个营长，参加了“北京政变”中驱逐溥仪及清皇室出宫等行动。冯的倒直及倾向革命，沉重地打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深为北洋各实力派所忌恨，各帝国主义也不断地向其施加压力。1926年1月1日，冯玉祥在英、日等帝国主义及张作霖、吴佩孚奉直两派军阀的压迫下于1926年1月1日通电“引退”，后赴俄游历。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雄壮口号中正式开始，北伐军在两湖战场很快取得重大胜利。北伐胜利进军，给冯玉祥很大的影响。9月15日，他从苏联归国。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退守在绥远一带的原冯玉祥部国民军，于9月17日在绥远五原誓师，组成国民联军，旋经甘肃、陕西、进入豫西，以期与北伐大军会师中原。

时任西北军36旅旅长的吉鸿昌虽不在五原，当得知消息后，立即召集部队，宣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率部参加北伐。冯玉祥根据中共北方区委帮助制定的“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方针，分兵十路由宁夏进军陕甘。吉鸿昌所部为先锋由兰州出发东进，参加围攻咸阳并占领。11月，抵西安城郊，与友军一起，将围困西安八个月之久的镇嵩军刘镇华部团团围住。当时天寒地冻，部队缺粮少弹，士气很低。吉鸿昌见此情景，立即从司令部走进战壕鼓动大家说：“北洋军阀祸国殃民，是人民的敌人，而刘镇华是北洋军阀的走狗，被围在城里的人正等待着我们去消灭他。”说罢，立即脱下棉袄，和士兵们一起在战壕里挨冻，大大鼓舞了士兵们的斗志。经过三天激战，刘镇华惨败而逃，西安转危为安。

1926年冬，36旅扩编为19师，吉鸿昌升任师长，率部进驻潼关。1927年5月，国民军联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东出潼关，会同国民革命军其它友军进攻河南。鸿昌率所部一举攻克洛阳，继又占领北县。与奉系军阀沿黄河南北形成对峙局面。这时，正值黄河汛期，河水暴涨，当地流传着“黄河天险水深暗流多，从无英雄夜间渡黄河”，使许多官兵望而生畏。吉鸿昌来到河边，对官兵进行动员，并组织敢死队，他让会游泳的每人一只空油桶，不会水的到木筏上。他自己也抱着一只空油桶，就跳进波涛滚滚的黄河里，敢死队员们跟着他破浪前进，直扑对岸，取得了突破黄河天险的胜利。为纪念此战役成功，吉鸿昌亲笔写了“天堑飞渡”四个大字，立石于黄沙峪。当时有人以“铁军”称呼吉鸿昌的19师，公认他的部队是西北军的王牌军。

随后，吉鸿昌指挥部队换上奉军服装，佯装敌军，占领豫北重镇新乡。他又协同友军攻占了安阳、沁阳，奉军大败而逃。

三、“公正纯洁，为做事而做官”

吉鸿昌所带领的部队，都佩戴着白底红边的圆臂章，上面写着：“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平时，他身体力行，诚励部队。他率领的部队，

在西北军中无论作战，军纪，俭朴耐劳都是很过硬的。他时常说：我从军时，就抱定为民造福的初衷，况且我本是穷棒子出身，自己队伍的所做所为，不能让父老们唾骂。许多官兵在他的影响下，都严格地要求自己，有些不老实的，也慑于他威严的军纪，不敢胡作非为了。

在民间中流传着许多值得颂扬的故事。

1922年，吉鸿昌所部移驻河南。在农民们进行夏收的季节，一天，狂风骤起，眼看就是一场倾盆大雨。这时吉鸿昌还在城里，他立即骑上快马，直奔农村部队驻地，命令全体官兵帮助农民抢收，并把抢收的麦子送到老乡家，等暴风雨来时已收割完了。他还命令部队把牲口借给老乡耕地，叫士兵帮助劳力缺乏的农户代耕。老乡们送马草给部队作为酬谢时，官兵们不肯收，说道：“我们是吉鸿昌的部队，他不许要老乡的报酬。要是我们违犯了，还得受严重处罚哩！”

吉鸿昌在生活上力求俭省，平时爱吃面条，只要有点酱油、醋和几个干辣椒就行了。由于他亲身体会到没有文化的苦处，他立志要为贫苦子弟办所学校。1922年，他带着积攒下来的几百块银元回到一别近十年的家乡吕潭镇。一路上他对同行的文书郝子固说：“要使中华民族这个睡狮猛醒，不受外国人欺负，改变贫穷落后状况，光靠咱们这些当兵的打仗不够，要有长远打算，这就是要贫穷子弟上学读书，过去自己没有机会上学，尝到没文化的苦。所以准备在家乡办学，免费招收贫苦子弟读书。”文书听后表示这些血汗钱用上也不够。他说：“事在人为嘛，由小到大！”

回到家乡后，他就着手办学。校舍设在原来的城隍庙。还说服了文书郝子固留下，当校长兼老师。第一年仅招了七个学生。后来采取半工半读、生产自救的办法办学，买了织袜子和毛巾的机器，组织学生劳动，解决了学生吃饭和买书问题，吸引了不少穷苦学生来校学习。鸿昌每次回家，都要看望师生。有一次，他给全校师生讲话说：

“国家虽贫穷落后，但我们决不自甘落后，要学好知识改变国家的面貌，要为国为民争气。”

到1929年，学生发展到1600名，教师百余名，其中有些是中共党员。

吉鸿昌嫉恶如仇，对自己的亲戚也不例外。他家乡有一名叫吉星南的堂侄，仗恃他的名望，在乡里横行霸道。此人为霸占一妇女，竟把她的丈夫及母亲害死。凶手吉星南被押在县里一年多也没有法办。吉鸿昌在家乡听到群众的反映后，他向乡亲们表示：“请父老们放心，我吉鸿昌从来不作对不起乡亲们的事情。谁要想借我的名义欺压百姓，就是我的亲老子，我也决不宽容。”他还写信质问县长：“我当师长，他杀人家全家，你不问罪；如我当了军长、总司令，他不就要杀死人家全村、全县吗？”

接着，他亲自到县衙门提审杀人犯吉星南，立即宣判死刑，并把罪犯枪毙示众。这一行动大快人心，乡亲们莫不拍手称快。

在大青山以北通往呼和浩特市之间的蜈蚣坝，有一块当地群众为吉鸿昌立的修路纪念碑，还有鸿昌亲自在路旁石壁上写的“化险为夷”四个大字。原来这是吉鸿昌在1926年驻军绥远、兼任省警务处处长时，发现蜈蚣坝这一南北通道要塞地势险要，常常造成伤亡事故而自己出钱，带领士兵，并在当地居民的支持下，打石放炮，用了几个月时间修成一条大路，车辆运行畅通。至今群众立的碑和鸿昌题字还矗立道旁和石壁上，成为人们凭吊吉鸿昌的地方。

在山东曹县一带至今流传着吉鸿昌亲毙战马的故事。1927年夏，鸿昌率部北伐经山东曹县时，他心爱的一匹战马脱缰，啃了老乡的庄稼，被老乡捉住送回。鸿昌当即向老乡赔偿道歉。第二天清晨，他在打麦场上集合队伍说：“行军打仗，不许损坏老乡的庄稼，这是我吉鸿昌定的纪律。现在我的战马犯了纪律，我对不起老乡，对不起弟兄们。”说完就拉出那匹战马，亲手枪杀了。

1928年夏末，吉鸿昌的部队驻甘肃天水地区。当年甘肃遭旱灾，饿殍遍地。他命令部队将省下的粮食做成米饭和粥分发给难民。他还背着干粮下乡访贫问苦，并用专车将一些孤儿送往河南老家，供养他们上学。

当时，他所接收的别的部队有违反纪律的现象。群众派代表向吉鸿昌反映他们抢掠钱财，打骂百姓，还有一个连长奸污民妇。当部队开至一个大沙滩时，命令部队打开背包进行检查，结果，从老百姓那里抢来的东西都暴露出来。为整顿纪律，他命令将强奸民妇的连长及作恶的18人当即枪毙。他对大家说：“我们为救国救民而入伍，决不能容忍这些孽种为非作歹，欺压老百姓。如不严惩，就对不起老乡们，更对不起自己的父老兄弟。今后谁再欺压老百姓，就是这样的下场。”由于部队纪律整顿好了，得到人民的信任，不到一个月，部队由一千多人发展到一万多人。

1929年夏，吉鸿昌率领11师奉命赴宁夏剿匪，收复了被土匪头子马仲英占据的宁夏城，后就任宁夏省主席和第10军军长职。他励精图治，决心为民兴利革弊，在自己的照片上写下座右铭并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面：

公正纯洁，为做事而作官

训练民众，使知四权，运用政治

注重下层工作，适合一般民众需要

为除掉吏治黑暗，他组织了考察队分赴各县考察。宁夏是回民聚居的地方，他对回民的苦难生活十分同情。由于土匪马仲英造成的恐惧，省城的回民几乎逃跑一光。当吉鸿昌的部队进城后，有的回民就认为这一下该“见回不留”了。鸿昌得知上述情况后，就特别重视推行回汉合作的政策，派出大批政工人员，到各乡回民聚居地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只分良莠，不分回汉的道理。当他得知有一个警察枪杀了一个回民时，立即把这个警察予以正法，并发告示，保护和安抚回民。这样，回民才渐渐回城的回城，还乡的还乡，社会秩序逐渐安定下来。随后，他又召集全省的回教阿訇开会，将大教主请到省城，优礼有嘉，馈赠丰厚。他还常常穿着回族衣帽到清真寺去，以示尊重回民，保护回教。他曾派人作大幅标语、宣传画张贴城乡，其中有一幅画是两个回汉人相对握手欢聚的大画悬挂在通衢大道上。他所主持印发的一本名叫《醒炮》小册子，里面写道：一些受骗回民“每每跟着少数有野心的人胡闹，乱抢乱杀，结果回汉两方面的民众，都不能讨便宜。死的成千上万，少数的反叛头目，总是死不着他，反而高官厚爵。”由于吉鸿昌真心实意地为回民谋利益，回民们感念他，亲昵地叫他“吉回回。”

吉鸿昌还决心开发西北，提出“开发大西北”的口号。他认定：开发广漠富饶的西北，实为中华民族解决生活问题的一条好出路。要“化剑戟为农器，舍破坏而生产”。他自任开发西北总指挥，在部队成立了拂晓读书会，组织团以上军官参加学习，后又扩大到营以上军官。经过学习，一些家在中原、不安心在西北服役的官兵安下心来，愿为开发西北贡献力量。吉鸿昌立志开发西北的壮举，受到西北民众的支持和拥护。

吉鸿昌常对妻子胡兰英（胡洪霞）说：“你多么幸运呵，生在一个小康之家，还能读书上学，可是咱们从甘肃、陕西到河南，所到之处，都是民不聊生，饿殍遍野，惨不忍睹。我扪心自问，于心何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家这样落后，百姓这样贫穷，咱们也有责任啊！”

他还说：“我国地大物博，百姓勤劳勇敢，只要好好干，铲除了骑在百姓头上的贪官污吏，不愁不能富强起来，咱们得有点儿中国人的骨气，中国是有希望的。”

四、“真正的出路在那边，这个仗咱们不能打”

由于冯玉祥的部队参加了国民革命，并组织了国民军联军，部队中有不少共产党员，联军的政治部副部长的职务就是由中共党员刘伯坚担任。1926年冬，吉鸿昌奉令率部进驻陕西，这时他已升任为19师师长。在此期间，他也结识了不少共产党人。如他经常和中共党员魏野畴交谈政治形势。魏是中共陕西党的创始人之一，又是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部副部长，并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中共陕甘区委委员，负责宣传工作。他以总司令部政治部的名义，选派大批共产党党员到所属各军、师、团、营做政治工作，并在部队中建立中共党组织，秘密发展党员。仅总政治部政治保卫队就有共产党员近百名，有的担任部队领导职务。吉鸿昌就是他进行这些工作的渠道之一，吉鸿昌的19师就有经魏野畴输送来的不少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

1927年4月，国民军联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中共党员宣侠文任前敌总指挥政治部主任。他也经常率政工人员在各部队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宣讲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

吉鸿昌经常和魏野畴、宣侠文交谈，对他们派的政工人员都十分尊重，和他们一起谈心，一同宣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次他对营以上军官的讲话中强调：“今后部队训练要着重于政治思想教育，不能单纯搞一、二、一老一套。没有政治工作，就没有思想基础。”为此，他将政治工作要点编成小册子，印发给官兵记牢。他自己也在床头贴上政治工作的要点，以便经常背诵。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清党反共。此时冯玉祥态度发生了变化，他到徐州会见蒋介石，参加了徐州会议，决定清党反共。此后，在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内大批共产党员被“礼送”离队。而吉鸿昌的部队则没有实行“送客”，并暗中保护了一些共产党员及政工人员。

由于吉鸿昌及19师的威名遭到一些人的忌恨，因此流言蜚语接踵而来。1928年，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指挥兼山东省主席孙良诚借故取消19师番号，免去吉鸿昌师长之职，并调他到北平陆军大学特训班学习。这期间，吉鸿昌经常与共产党员秘密来往，并借了许多革命理论书籍阅读，明白了不少道理。同年秋，他被任为第30师师长，奉令赴甘肃剿匪。途经洛阳时，吉鸿昌又专门带了原19师中活动过的地下党员及部分进步学生，一道奔赴西北。

吉鸿昌在宁夏致力于开发大西北期间，共产党员李子纯等人到他的部队开展工作，得到他的大力支持。在共产党员的帮助下，他组织了官佐执法队，配合军法处检查部队的军风军纪和群众纪律。他还拿出500元购买图书，创

办了拂晓读书会，组织军官学习革命理论和文艺知识，并为士兵编写识字课本。

因冯玉祥在南京国民政府里与蒋介石发生矛盾，遂离开南京到河南辉县。1930年3月，冯、阎、桂三派联合反蒋，即爆发中原大战。吉鸿昌开发大西北的理想成为泡影，也被卷入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他率部开往豫东作战，曾重创蒋军，打了不少胜仗。但战争最终以冯阎失败而结束，冯玉祥下野离开部队隐居。其所部分别为蒋介石收编。吉部被改编为第22路军，吉鸿昌被任命为总指挥、兼任第30军军长、第30师师长。

此时，吉鸿昌看到新军阀混战把人民推向水深火热之中，内心痛苦万分。他的这种心情，在后所写《环球视察记》的序言中表现出来：民国成立以来，“无岁不战，无地不战。民众固极痛苦，官兵亦多牺牲。我也曾摇旗呐喊，身经百战。除躬亲受伤多次外，我的弟弟已战死；我的胞侄已战死；我的最亲爱而可怜的袍泽，因参加战役而死伤者，亦以万数。然一问偌大高价所买何物？实仅不过‘内忧外患，愈逼愈紧’八字，馈遗后死者享受。我除了无限悲痛而外，还有什么可说？”

随着中原大战的结束，1930年11月，蒋介石调集10万大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军事“围剿”，并用9个多师的兵力进攻鄂豫皖根据地。吉鸿昌所部驻扎在豫东南潢川、光山一带。蒋介石派特务冷欣来部队任高级参议，严密监视吉鸿昌，要他进攻鄂豫皖根据地。

蒋介石对异己一贯采取“先与后取”的笼络手段，然后分化瓦解，最后予以消灭。蒋介石的高级特务冷欣对吉就是采用这种手段。他曾秘密地用金钱收买22路军的军官。他还对吉鸿昌施加经济压力，使他连续一两个月收不到部队的经费，经多方奔走，才发给一点菜金和给养费，给部队造成不少困难和纠纷。蒋介石还对吉鸿昌采取武力威胁，将镇压石友三的部队调驻陇海线和平汉线上。吉鸿昌觉悟到投归蒋介石是走错了路，同时认识到22路军进攻苏区是上当受骗。因而22路军与苏区成了无协议式的罢兵休战状况。22路军内的地下党组织根据吉鸿昌的思想转变，安排他到上海会见中共党的负责人。吉鸿昌托病要到上海就医，这一行使他思想有了进一步提高，他十分感慨地说：“我出身行伍，戎马半身，身上受轻重伤二十余处，但这些血都不是为工农大众流的，而是为军阀流了！前半生已矣，后半生当直追。掉进泥坑的人想爬出来真不容易，我是用眼泪和鲜血才找到了‘阶级革命’这四个字的。”

尽管蒋介石一再电促吉鸿昌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但他总是以各种借口，按兵不动。实在拖不下去了，他就密派88旅的一团士兵化装成红军游击队，半夜鸣枪攻打潢川城关，又派部队迎击，然后上报：红军主力逼进潢川，城防难保，无力“进剿”。有时，被迫出发进攻根据地，也是虚打几枪，丢些枪支给红军，兜个圈子回来。

据当时在他的部队中任职的中共地下党员路跃林回忆：光山、潢川毗邻苏区，鸿昌同志在一间密室里指着苏区方向说：“真正的出路在那边，这个仗咱们不能打，如果搪塞不过去，就冲天放枪，做做样子。”

在潢川，吉鸿昌还经常对部下说：“国民党的饭不能再吃下去了，国民党的官也实在做够了。我文官做到省主席，武官做到总指挥，究竟给老百姓办过多少事情？今后必须摆脱这个肮脏的环境，另辟新的生路。”

这时，在上海的党中央军委军政情报部根据吉鸿昌的思想发展，决定派

刘仲华通过邓宝珊与吉鸿昌进行秘密联系，策动吉部起义，实行兵变，把部队拉到根据地。邓宝珊曾专程到河南，与吉鸿昌进行了长谈，这更坚定了他率部起义投奔红军的决心。

一次，吉鸿昌在潢川东郊大操场对旅长彭国桢讲：我们的出路前途在那边。他用手指了指革命根据地的方向。

“国将不国，尔速醒悟；
睡狮猛醒，领导民众。”

这是吉鸿昌到光山县巡防时，望着城南仅一河之隔的苏区，心潮起伏，遂在县城的石狮子上写下的几个大字。他走后，当地老石工按字样精刻细镂保存下来。这也是吉鸿昌对他自己发出的强烈呼唤。

1931年5月，吉鸿昌命令路跃林组建游击大队，驻在光山城南河边，对岸就是苏区。其任务是接送来往根据地的人员。此后，吉鸿昌又与鄂豫皖根据地进行联系，几经周折，他终于见到其领导人，临别时他将自己所带“水晶养目镜”等赠给徐海东等负责人。他表态，自己的部队决不进攻红军。

正当吉鸿昌积极与红四方面军联系，并秘密组织部队准备起义参加红军时，突然遇到罕见的大暴雨，部队下不了山，出不了城。这时，蒋介石已得到冷欣密报。待到水退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汤恩伯、陈诚等十几个师已从湖北开到潢川附近，将吉鸿昌部团团包围。吉鸿昌命令部队集合在潢川城南大操场上，宣布起义，开往苏区。但当即遭到被冷欣收买的31师师长张印湘的反对，33师师长葛运隆害怕到苏区吃苦，不愿意起义，旅长彭国桢虽赞成起义，但不敢公开表态，致使吉鸿昌的潢川起义流产。

蒋介石急派李鸣钟（吉鸿昌过去的上司）前去分化瓦解这支队伍。1931年8月，吉鸿昌的兵权被解除，他被迫离开部队前，暗中对其可靠的下属作了应变的布置。如交给第88旅下面的两个团长各5000元军费，嘱咐他们：“必须时刻小心，见机行事，必要时你们可以把红旗一打，将队伍拉上找徐向前去。”但由于他俩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形势缺乏正确的认识，并未按吉鸿昌的指示去做。

五、“何忍去国远游，逍遥异域”

1931年9月，吉鸿昌被蒋介石强迫“出国考察”，在国民党特务的挟持下来到上海。

正当要启程的时候，9月19日，突从东北传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当吉鸿昌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后，他后来写道：

“噩耗飞来，发指眦裂。一向出国豪兴，遽行由沸点而降至冰点以下。盖以日帝国主义如此横行无忌，已视我全中华四万万民族曾稍具有抵抗能力之猪狗不如。此正吾全国同胞下总动员令，以与彼獠作殊死战，以为我国家争人格，为我民族争生存之日，何忍去国远游，逍遥异域？况在军人，素糜国帑，揆以职责，尤难旁贷。”

当时，吉鸿昌悲愤已极，将备好的出国服装撕毁，向蒋介石要求参加抗战，却遭到无理拒绝。蒋介石命人将吉鸿昌的妻子胡洪霞先强行送上船，迫使吉鸿昌出国。他曾愤慨地对朋友说：“国难当头，报国有期，蒋贼不灭，革命不息。”临行前，他还写信给冯玉祥，劝他举旗抗日。他在所住饭店墙上写下“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诗句，以表自己的愤慨和抗

日之决心。

9月23日，吉鸿昌在上海登上美国大来邮船公司塔夫脱总统号轮船时，还对夫人及随行人员发问：“他们为什么连抗日也不准许我呢？”

9月25日晨，轮船抵日本神户。吉鸿昌深恶日本的侵略行径，原本“不愿登临彼土”。因惦念祖国东北局势，便决定登岸后便驱车前往东京中华青年会了解情况。在日本短暂停留，使吉鸿昌了解到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占，“原系有组织的有计划的行动”，“狼子野心，蓄积已久”。继而想到国内蒋介石之流仍在进行内战，他心情更是沉重。他在其《环球视察记》中写道：

“日谋东省甚久。最近因我国内灾患频仍，无力对外；英国经济濒于危机，无暇过问远东事情；俄国五年计划，尚未完成；而美国之军事力量，又为日本素所轻视者，日军阀遂视为侵略我国之绝好机会。惜我国军人不明了此种动机，预事未雨绸缪，乃或纵横，从事武力统一，或视军队为资本，侥幸经营投机事业，致铸成大错。”

“中国军人，迷信武力，对内厮杀，目的何在？殊难索解。现值大祸临头，倘仍不思合作图存，中华民族前途，将愈黯淡也。”

9月27日，吉鸿昌离日赴美。10月6日，船抵美国西雅图，吉鸿昌回答了美联社记者的提问。其要点是：

问：“贵国政局如何？”

答：“敝国有一成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现在大难当头，全中华民族皆有联合方能图存，私人政见皆可捐弃。统一不久必可实现。”

问：“将军对日本进兵占领满洲，意见如何？”

答：“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即抢一大陆政策。鲸吞满洲，早具野心。今乘敝国苦于天灾人祸，世界苦于经济凋蔽之秋，实行强占，直接侵略中国领土，间接破坏世界和平。”

在谈话中，吉鸿昌表示了自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牺牲一切，为生存而战，为公理而战”的决心。

在美国各地的近两个月参观访问中，吉鸿昌透过纽约、华盛顿等大城市繁华的表面，看到了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以及存在的重重矛盾。他写道：

“机械发达，在其本身本属善事。惟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却不幸因机械之极度发达，愈益减少贫穷者之谋生门路，使机械却无形中成为劳动阶级之敌人”。

看过纽约的“凌霄”大楼，他又写道：

“以无数人劳心劳力的结果，方得致地方之繁荣，而其利益竟归少数投机家独享之，甚至利用其因投机所不劳而获之雄厚资本，愈以压迫剥削其他大多数人。”

综观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他写道：

“有一德记者至美视察，谓美国实际只有十人，盖此十人之经济力量，足以左右此‘金元政治’之国家而有余也。因资本累积之结果，势必至富者愈高，而贫者愈贫。”

吉鸿昌在其《环球视察记》中，还“不禁发生感慨数端”，他写道：

“现今世界，不惟国内之分配不均，即国际间之分配亦不均。……国内之分配不均，于是发生社会革命。国际之分配不均，将终不免种族战争。此其一也。”

“自白人移入美洲后，即极力压迫红人。……迄于今日，原为美洲主人

翁之红人，皆匿居深山中，仍营其原始社会之生活。吾人横断北美全大陆，并未曾得见红人之毫发。所谓美国人之人道主义，如是而已。此其二也。”

“当白人来到美洲以前，红人足迹，固遍美洲也。今则日就绝灭……灭种惨祸，闻之寒心。吾汉族如不自振作，恐将难免为红人续。人口四万万，又乌足恃？此其三也。”

这些不寻常的经历，更加提高了吉鸿昌的民族自尊心。以下讲几个故事：

1931年11月1日，吉鸿昌初到纽约港。跟踪监视的国民党特务曾经劝他脱帽，以示敬仰之意。鸿昌说：“这里有人住这么好的大楼，有人住贫民窟，我不喜欢它，也不脱帽！”

有一次，他要往国内寄衣物。美国邮局的某职员竟然说：“不知道中国”。一些洋奴劝他说：“你若说是日本人，便可受到礼遇。”吉鸿昌怒目斥道：“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十足的洋奴，我却觉得中国人很光荣，很自豪！”回到旅馆后，他气得吃不下饭，就找了一块小木牌，写上“我是中国人”五个大字，每到外出参观都佩戴在胸前，在人群中昂首挺胸，显示出做一个中国人的骄傲。

吉鸿昌在底特律时，福特飞机制造厂的经理得知他是一位将军，就乘机兜揽生意，并且立即领他到仓库去看货。不料那些飞机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剩余的旧式飞机，这位经理还一再说愿意贱价出售。鸿昌当以讽刺的口吻回答：“我劝你们还是将这些东西送进化铁炉里好了。”

吉鸿昌在参观福特汽车制造厂时，一个美国大资本家对他说：“我们美国汽车制造厂规模宏大，能够制造各式各样的汽车。中国只要多修筑公路，购买美国汽车是最经济的办法，比你们自设工厂要合算得多。何况你们没有技术，也自设不了工厂。”吉鸿昌轻蔑地一晒，说：

“美国过去也没有汽车，你们的汽车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中国今天没有技术，明天就会有的，中国人又不是笨蛋，相信总会有一天也会有大工厂，会自己造汽车。”

1931年10月6日，吉鸿昌刚到加拿大维多利亚港的时候，就有美联社记者来访问他。

记者问道：“日本人有飞机大炮，中国人此时声言要抗日，你们凭什么抗日？”

吉鸿昌愤然拍着胸脯答道：“我们有热血，我们有四万万人的热血。我国人民的愤激已经达到极点，莫不抱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誓愿牺牲一切，为生存而战，为公理而战！”

接着，他反问这个美国记者：“举世都知道是日本侵略中国，你们美联社为何造谣说中国人民要求日本出兵？”

记者答：“我们是写新闻的，新闻是忠实记录。”

吉鸿昌说：“你们是狗嘴吐不出象牙！”

记者一时弄不清楚这个成语的真意，还当是句赞扬的话，连声道：“谢谢！”一时传为笑谈。

11月4日，吉鸿昌在纽约接见世界日报社记者。

记者问：“中国将来有何方法驱逐日兵出满洲？”

吉鸿昌答：“中国人民之热血，现在因抗日火焰之燃烧，已滚腾至沸点以上，将来一旦与日宣战，不难一举而征集数百万义勇军。我国有形之军器，虽较劣于日本，然就无形之军器，即所谓士气与民气而言，却优于日本百倍。

师直为壮，曲为老。观于合众国之能战胜强英，则知我国之终必能胜日本也。”

讲毕，不容对方提出新的问题，吉鸿昌便指着对方的鼻子质问：“美国新闻界对于‘九·一八’事变的报道，为什么偏袒日本？你们是不是受了日本政府的贿赂？”问得美国记者张口结舌，无言答对。

11月9日，吉鸿昌乘船到达古巴首都哈瓦那。

11月12日，正值孙中山诞辰之日，在古巴的华侨数千人于中华戏院隆重召开纪念会。吉鸿昌在会上发表了演说。他说：

“日本侵略中国，早具决心，惜国人醉生梦死，埋首内战，致元气亏伤，援敌以隙，故今日之事，人民不负任何责任，亡国家者，少数军阀官僚耳。但人民须知，中国者四万万人民之中国，非少数军阀官僚之中国。国家亡，则就骨吸髓之人兽，腰缠万贯，拥有巨资，可远走高飞，过其资产阶级之亡国奴生活，而吾等平民，岂能出国门一步，国存受军阀官僚之剥削，国亡作帝国主义之牛马，当此千钧一发之际，作人与作牛马，间不容发，望及早团结，用热血拥护祖国。”

吉鸿昌刚讲完话，数千侨胞一起高呼：“牺牲一切，奋斗到底！”当场就有十多位青年要求跟吉鸿昌回国抗日。当晚，吉鸿昌又在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讲演。他因有感于侨胞救国的热情，痛恨国内军阀官僚，醉生梦死，丧权辱国，悲感交集，不禁泪如泉涌。到会侨胞，也都同声大哭，当即一致通过了“请政府即日对日宣战，旅古华侨愿牺牲生命财产援助，请国内各派牺牲私见，团结对外”及“誓死保全中国领土”等四项决议。

11月28日，吉鸿昌乘船赴欧洲，先后到过英国、法国、比利时、卢森堡、德国、丹麦、瑞典、瑞士、意大利等国，向各地侨胞积极宣传抗日。吉鸿昌到欧洲后，就积极联系到苏联去参观，为此曾在德国等了半个月。由于国民党驻欧各使、领馆的阻挠，这一夙愿，终未实现。

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进攻上海。吉鸿昌闻讯，未经蒋介石许可，立即结束了欧洲之行，乘船回国。

2月25日晨，船泊九龙，即乘渡轮往香港。吉鸿昌回首“港九割租之痛史”，写道：

“江山犹是，人民依然。而主权已非我有，未识何日方能重覩汉衣冠也。”

“吾人如再不发奋淬厉，从建设事业着手，尚复有何面目高谈革命，吐骂帝国主义耶？”

2月28日下午2时，吉鸿昌乘船抵上海。这时，停泊吴淞口外“排列整齐之日军舰十余艘，正集中炮火，向我吴淞炮台扫射”。吉鸿昌眼看“吴淞全市，尽成瓦砾。浦西建筑，亦多破毁。江湾迤西，火光熊熊，黑烟阵阵”，而国民党的军舰却“正深匿他国军舰尾后，韬光养晦”。吉鸿昌不禁悲愤填膺，说：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今日贼竟深入堂奥，刺刃我胸。我辈军人，能勿愧死？”

下船后，一个象新闻记者模样的青年走近他的身边，诚恳地对他说：“吉将军，光你一个人喊哑了嗓子也不顶事，要是和千百万人民站在一起，为他们而战！这力量可就大了。”吉鸿昌不禁被他吸引住了，他们进行了一些交谈。原来这个青年是奉中共党组织之命来接他的。

在《环球视察记》这本书的末尾，吉鸿昌压抑着满腔悲愤，写下乍返祖国时的感怀：

“及抵沪，承多友迎馆于一品香。偶询国事，知各派分道扬镳，明争暗斗，较前加厉。已是伤心！乃夜静更深，又只闻帕帕之麻将声！呀呀之清歌声，与闸北一带轰轰之炮声，遥相应和。‘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民族颓唐堕落，不图竟至于斯，当环游各国时，每闻见他人之长处，辄回忆及国人之短处。虽其刺激为间接的，已不胜其悲愤。乃走进国门，凡目所见，耳所闻者，竟无一非亡国灭种现象。且较去秋离沪时，有过之无不及，孤灯明镜，偕影晤坐，默念国家前途，心胆全为破碎。吾书至此，吾手已栗，吾喉已梗，吾泪竟不禁夺眶而出。吾不得已，即于此结束吾之游记。呜呼！是岂余等出国时所料及哉？是又岂余等返国时所及料哉？！”

六、“只有服服贴贴地跟着共产党走，被压迫的贫苦人民才能出头，中国才能得救”

吉鸿昌回国后，蒋介石便搜罗了一批他在西北军时候的旧幕僚，到上海去劝吉鸿昌“回心转意”。

这些说客装作十分关切的姿态对鸿昌说：“你出国考察了一圈，一定会感到兴办实业的重要，咱们可以一块开办工厂，开办托拉斯！”

吉鸿昌毅然谢绝他们的“好意”，并说：“我是军人出身，军人救国的天职是卫国杀敌，不是发财！”

吉鸿昌暂时在上海住下了。经多方帮助，吉夫人也随后回国。他很快的和党组织开始接触。他向原在西北军中当牧师、当时给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人员当翻译的中共党员浦化人表示了要参加革命的心愿。随后，他又与上海党组织的代表见了面，并商谈了开展抗日救国的计划。

不久，吉鸿昌离沪返回天津。在津继续与中共组织接触，并多次去北平活动。后通过西北军中党的关系与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负责同志见面，并提出参加共产党的要求，接受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号召旧部起义，开到苏区去。

1932年5月，根据党的意见，吉鸿昌又秘密奔赴上海。他一面同宋庆龄等爱国进步人士进行广泛接触，并参加了东北抗日救国后援会的工作；一面又秘密派人和仍在湖北地区被迫进攻鄂豫皖红区的旧部取得联系。

8月，吉鸿昌决定亲自到湖北黄陂、宋埠一带收集旧部，然后起义投奔红军，参加革命。当他历尽艰险找到第30师的驻地时，发现他的旧部经蒋介石分化瓦解，原来的队伍已经分散改编了，要想把这些分散的队伍集中起来投奔红军是十分困难的。他首先在第90旅中一个贴己的团里稳住脚根。

吉鸿昌来到这个团，就召集倾向革命的团、营长谈话，还同一些跟他多年的老兵和连、排长见面。他说：“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不得人心，遭到全国军民的反对，除了他那几个嫡系部队。现在全国军民抗日情绪高涨，我们如果不能乘此大好形势，有所作为，这辈子就算完了。”这样，原已埋下的火种很快就燃起熊熊的烈焰。

但是，蒋介石很快得到了吉鸿昌回部队策动起义的密报，急令鄂豫皖三省“剿匪”司令部参谋长曹浩森对吉鸿昌进行诱捕。

吉鸿昌看到情况紧迫，只好决定带上30师的一个团奔向苏区。由于敌人四面围追堵截，起义失败。最后，他只带着十几个人，冲出敌人的重围，进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在红安县的长冲，吉鸿昌先见到鄂东游击部队司令员郑住三，随即受到

苏区负责人沈泽民、徐海东等的热烈欢迎。在苏区期间，吉鸿昌与沈泽民等苏区领导人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和抗日救国的方针，常常竟日不倦。

一次，吉鸿昌表示要参加红军时，徐海东说：“你不如独树一帜，自己另干起来，我们可以南北呼应打击敌人，这样比起义的作用大。”吉鸿昌同意了。

由于吉鸿昌有重任在身，不能久留。临别时，他把自己的望远镜、金怀表和养目眼镜分别赠给沈泽民、徐海东等人。红军护送他到长江边，辗转回到上海。

吉鸿昌率部起义的计划虽未成功，思想却非常乐观，革命意志益形坚决。他从大别山潜回上海已是9月下旬。他在一个朋友家里出现的时候，身着一件不合体的破大褂，脚穿一双破布鞋，满脸络腮胡子，头发也很长很乱。但是他的精神挺好。他说：

“这次起义虽然失败，却使我的脑袋瓜子开了窍。有许多事情，过去自己觉着已经明白，可是明白里头还有糊涂。虽说干革命的决心早就下了，做起事来还只是想到自己的部队，忘记了人民的力量。这回才算真明白了，才算认识了救国的真正道路；只有服服贴贴地跟着共产党走，被压迫的贫苦人民才能出头，中国才能得救。光要个人英雄是不行的。往后我要从头做起，献出我毕生的力量去干！”

吉鸿昌在朋友家里住了三天，又装扮成一个患了严重心脏病的北方商人，化名王敬之，转移到静安寺路一家外国人开的旅馆五层楼上隐蔽起来。

1932年8月，国民党反动政府秘密下令通缉吉鸿昌。复兴社特务处在天津建立了特务组织。此时，吉鸿昌已秘密回到天津，并去北平向党组织汇报，他再次向党组织提出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党组织接收他为中共党员。根据当时的国内形势：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了我国东北、拼凑伪满国之后，把侵略的矛头直指热河。党组织指示吉鸿昌协助冯玉祥准备进行察北抗战。

在民族危机加深，全国民众抗日高涨的形势下，冯玉祥结束了在泰山的隐居生活于1932年10月来到靠近抗日前线的张家口，愿与共产党人合作抗日。

1933年1月1日，日军进犯山海关。3日山海关沦陷，日军大肆屠杀中国军民。2月，日军纠合伪军共10万人，分三路向热河进犯。3月4日，日军侵占了热河省省会承德。日军占领承德后，即进抵长城各口。驻长城内外的中国守军，在全国抗日热潮的推动下，自动奋起抵抗，给骄横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为中华民族争得了光荣。当时，“驱逐日寇，收复失地”的呼声响彻华北。组织起来，一致对外，成为全体军民的共同愿望。

此时，吉鸿昌已在津积极联络各地零散的抗日武装，还变卖了自己在南京、河南的私产，集资购买枪支，准备进行抗日。

3月25日，吉鸿昌乘火车到达张家口，在张垣土尔沟“爱吾庐”与冯玉祥促膝长谈，冯玉祥决定给吉鸿昌编一个军。中国共产党为便于领导察哈尔抗日，已经成立了张垣特委。特委派出吴化之与吉鸿昌联系，担任将由吉鸿昌统率的抗日部队的政治部主任。

为了争取孙殿英的四十一军抗日，吉鸿昌按照特委的意见，他面见了孙殿英。凭着在西北军时的“交情”，吉鸿昌向孙提出要人要枪组织抗日军。孙殿英吞吞吐吐不做明确答复。一日，吉鸿昌应孙之邀请在温泉洗澡，挥手在壁上题写了“洗耻”二字，对孙晓以大义。

察哈尔抗日刚刚酝酿，就遭到蒋介石南京政府的阻挠。为此，吉鸿昌一方面投书朱子桥先生，说明察省组军情况，力促由朱领导的抗日后援会提供援助；另一方面为解燃眉之急，决计毁家纾难拿出六万元购置军火。他派人到天津协助夫人胡洪霞买了一批冲锋枪和勃朗宁手枪，通过关系，租用“满铁路汽车公司”的汽车，并由夫人胡洪霞亲自将枪由天津运到张家口。这时吉鸿昌收集到了退到察省、无人统辖的义勇军数部，加以整顿编制并予以服装械弹的补充，同时装备了志愿抗日的民众武装数部，他还挑选了一些精干人员组成手枪连。

吉鸿昌的夫人胡洪霞将军火运到张家口的时候，吉鸿昌正住在张垣郊区的一座破庙里。夫人见他生活十分艰苦，睡的是土炕，吃的是玉米棒子，就劝他保重身体。鸿昌笑指着两边的鬼判说：“你看有他们给咱站着岗，最保险了。”

1933年5月，中共河北省根据形势的发展，为加强对察哈尔抗日工作的组织领导，成立了前线工作委员会，原中共华北“特委”撤销。

七、“是好男儿，舍身报国”

5月24日，盘踞多伦的日伪军南侵，进占了沽源，察哈尔省的形势日益危急。张家口的军民及各军驻张代表，都认为奋起抗战，刻不容缓。经各界代表决议，立即组成了察哈尔省民众御侮救亡大会，并决议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公推冯玉祥为总司令。26日，冯发出通电宣告就职，并派佟麟阁暂代察省主席，吉鸿昌代警务处处长兼张家口警备司令，张允荣代财政厅厅长。全国许多群众团体、社会名流、省市当局、高级将领纷纷致电祝贺和支持。

参加抗日同盟军的部队有察省的地方武装、原防守长城各口的爱国军队、原西北军旧部、方振武在晋南组织的抗日救国军和从东北各地撤退到察省的义勇军等。北平、天津、太原等地的学生也成批参加了。这支抗日武装很快发展到10余万人。

在此期间，吉鸿昌曾写信给宋庆龄进行联系。还写信给在日本的南汉宸，邀他回国参加“察北”抗战。

6月15日至19日，召开了同盟军第一次代表大会。到会军民代表61人。对同盟军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作出纲领性的决议案。指出抗日同盟军为革命军民的联合战线，旨在外抗暴日，内除国贼，主张武力收复失地等。大会决议组织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推举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宣侠久、张慕陶等11人组成常务委员。

在同盟军没有组织起来以前，日伪军已经侵占了察哈尔省东北部的多伦、康保、宝昌、沽源四县。同盟军成立后，冯派吉鸿昌为前敌总指挥，在张北县以北地区布置防务，防止日伪军继续进犯。同盟军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冯对军事又作了新的部署，任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邓文为左翼副总指挥，李忠文为右翼副总指挥，率领大军克日北进。为了统一指挥，特派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军事行动计划是先收复察省东北四县，使察省恢复完整，然后再作二步打算。吉鸿昌率领部队不到十天就相继克复了康保、沽源、宝昌三县，军威大振。6月29日，吉鸿昌向总部发出的一个电报说：

“鸿昌等督饬主力军队，三路进攻（宝昌、沽源）。士气沸腾，欢声震地，深足以表示我数万健儿之头可断而志不可夺也。惟塞外荒凉，居民犹复

事中古生活，苦鸟惨兔，涕笑人间，幕雁釜鱼，哀鸿遍地。鸿昌等生有限而耻无涯，计有穷而惶未已。誓以一腔热血，努力迈进。与其怕死偷生，而生也痛。孰若赴义以就死，其死也荣。成败而非所计也。……”再度表达了坚定的杀敌决心。

7月1日，吉军收复宝昌。这一仗，俘获甚多，除日伪军官兵外，还捉了敌人雇用的外籍俘虏37名。盘踞沽源的伪军头目刘桂堂，也派人来向吉鸿昌接洽投降，于7月1日通电反正，率领他的部队参加民众抗日同盟军。尚驻沽源之伪军张海鹏之一部遂陷孤立，被抗日军余亚农部击退，毙敌700余人，俘500余人，沽源遂告收复。

吉鸿昌率领大部兵力乘胜向多伦前进。多伦是察省的商业重镇，当地人称之为小上海。日军视之为攻掠察、绥的战略据点，在这一线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

7月4日，吉鸿昌得到情报：蒋介石与日军取得默契，由日方出兵夹击同盟军。5日，吉鸿昌立即召开会议，一致认为必须迅速进攻多伦，以收先发制人之效。7日下总攻击令。决定当夜开始进攻。部队驰往多伦的路上，吉鸿昌即兴作诗一首：

有贼无我，有我无贼。
非贼杀我，即我杀贼。
半壁河山，业经改色。
是好男儿，舍身报国。

吉鸿昌等亲临前线指挥，7日夜彻夜激战，攻克敌两道战壕。8日激战至下午6时，迫敌退入城内。9日拂晓前，敌城外大部分据点被占领。但由于多伦城地坚固，敌火力猛烈，进攻受阻。夜间，吉鸿昌亲临攻城的部队，向战士们说：“我们这支常胜的抗日军，岂能打不下一个小小的多伦城？现在咱们就组织敢死队，我打头！不怕死的举起手来！”吉鸿昌亲率敢死队，勇猛爬城三次，均未成功，伤亡200余人。10日拂晓，又开始猛攻，因日机轰炸，伤亡重。11日，吉暗遣副军带精兵40多人乔装潜入城内。12日晨1时，吉鸿昌指挥全线猛攻，他袒臂冲锋，士气大振，直逼城下。这时，潜入城内的精兵高呼“同盟军进城了”，并四处开枪，使城内秩序大乱，日伪军在惊慌之中向城外溃窜，经过三小时的激战，同盟军由南、西、北三门冲入城内，日伪残部由东门逃走。经五昼夜的苦战，终于收复了多伦。

同盟军攻占多伦的战斗，是日军自从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来遇到的第一个沉重打击。日军损失惨重，中外震惊，全国各地爱国抗日团体和知名爱国人士纷纷致电祝贺，捐献财物，全国舆论为之一振。

克复多伦当天，冯玉祥曾致电蒋介石。这个电报描述了同盟军察北苦战的情景，同时表达了全军将士誓死收复失地的意愿：

“自上月20日晨出发以来，官兵饮露餐风，食不果腹，阴雨则鞍马尽湿，昏夜则席地幕天。且际兹酷暑天气，多有着皮衣皮帽以杀敌贼者，酸辛惨苦，困难万分。兹幸托全国民众之助，总理在天之灵，虽以饥寒疲蔽之师，挟腐朽窳残之械，而气凌霄汉，志雪国仇，旬日之间，恢复康保宝昌沽源等地，今又继续收复多伦。察省地区，可告完整。惟保察之任务虽尽，而东北四省之失地未复，瞻望河北，犹深惨痛。公等执国家大政，掌百万雄师，兵械之精，何啻宵壤，饷糈之富，更不待言。如蒙慨念东北同胞亡国之痛，废停战协定之约，兴收复四省之师，则祥虽庸患，敢辞鞭箠？否则，惟有自率十万

饥瘦之士，进而为规复四省之谋。一息尚存，此志不懈，成败利钝，至死靡他。”

吉鸿昌在横扫察北的时候，始终保有革命的乐观主义，和广大的官兵群众同甘苦，共患难。有一天，他曾骑在马上，一边走一边顺口吟诗道：

“抗日将军真是苦，骑在马上啃苞谷。”

这位统率数万大军的前敌总指挥身上，这时总共只有两个生玉米棒子作干粮。他见跟上来的一位老战友没带干粮，赶忙把另一个棒子分给他。

吉鸿昌对人民群众的疾苦也很关怀。其后部队克复察北各县，在他发往同盟军总部的电报里头，多次提到刻不容缓的战区人民生计问题。7月1日，他从宝昌前线发出的电报写道：

“我军乘夜驻宝昌县城。战后疮痍满地，伤心万状。抚恤救济，惟力是视。”

7月12日，又自多伦发电称：

“此间承只燹之后，十室九空，大军驻集，民何以堪。伏乞指示方略，俾便遵循。临电屏营，无任盼切。”而在6月24日由康保发出的电报，还曾谈到所部“骑兵第三师，于23日在城东剿匪，打落肉票十余名，耕牛七十多头，已飭公安局招领。”一个军事将领能够时刻关心人民的生活，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当时，吉鸿昌有两匹在同日军作战中缴获的日本军马。有一天，在察北行军途中，遇到两个流落荒野，无家可归的贫苦农民。一个因为缺衣少食，在严冬被冻掉十个手指，另一个右脚的五个脚趾也全被冻掉，身体衰弱，行动艰难。吉鸿昌在同他们攀谈中，了解到这两个人的悲惨身世，便把两匹马让给他们骑，自己和警卫员步行。他同这两个农民一边走一边攀谈，直到驻地。吉鸿昌指着两个残废农民对部队的干部战士说：

“我们时常唱的《国际歌》，开头第一句就是：‘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的罪人！’他们就是被反动地主剥削得饥寒交迫的奴隶，他们就是被万恶的旧社会压弯了脊梁的、苦大冤深的‘罪人’。我们抗日救国，我们干革命，就是为了解放这些奴隶，就是为他们谋利益的。”

吉鸿昌还时常说：“要抗日救国，学习武艺最是重要，艺精胆壮，胆壮勇生，勇生智广，智广渺敌，渺敌则可胜之矣。”他非常痛恨“抗日必亡”的失败主义的谬论。

15日，抗日同盟军与多伦民众在山西会馆召开万人大会，庆祝收复多伦。会上，吉鸿昌宣读了察哈尔民众致前线军民的贺电和冯玉祥总司令的贺电，并向到会的民众和士兵介绍了专程由张家口赶到多伦慰问抗日同盟军的御侮救亡会代表。

25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华北御侮救亡会代表大会在张家口开幕，抗日同盟军总部成立了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准备进一步收复失地。抗日同盟军高级人员均为该会委员。

然而，面对大好的抗日形势，蒋介石却命令何应钦派重兵大举进攻察哈尔。到20日，进攻的兵力达到18个师。吉鸿昌与抗日同盟军各将领联名发表通电，遣责南京政府的卖国行径。通话说：

“誓以战士之碧血，渲染塞外之秋草……四省不复，此志不渝，愿全国民众共起图之。”

8月上旬，抗日同盟军在日军和国民党中央军的大包围之中，国民党的

军队达 16 师，20 多万人，包围大军节节进逼。与此同时，何应钦又从抗日同盟军内部进行收买瓦解，致使同盟军内部发生动摇，加之财政困难。冯玉祥苦于内外形势及个人困难处境，于 8 月 14 日不得已而下野，离开张家口。同盟军被分化。

8 月 7 日，中共前委会议决定，以吉鸿昌、方振武名义通电声明反对取消抗日同盟军，表示誓死抗战到底。

通电首先揭露国民党反动军队“如此公然与关东军采取联络之战线，实为世界亡国史中未见之奇迹。振武等在内外夹攻之恶梦中，深痛民族有此不磨之污点，较之四省之失，更为可耻。”继则声称：“振武等在四省沦亡之日，无复偷生之念。正义所在，不辞汤火，光荣之死，甘于鼎镬。全国民众必须了解，同盟军将士无论在任何环境中，即仅余最后之一弹，亦必为抗日而牺牲。富贵不淫，威武不屈，凡我袍泽，危舟共济，认清敌友、判明是非。为国家雪奇耻，为民族争生存，勿自被人陷于不义而已。”重新申述了抗日到底的决心。

8 月 8 日，日寇飞机轰炸多伦和沽源，并向多伦大举进攻。

按照前委的意见，吉鸿昌命令部队分批于夜间撤出县城。多伦的汉、回、蒙各民族民众得知同盟军要走，含着眼泪伫立街头送行。汉民捧着大饼、炒面，蒙民牵牛送羊，回民则在清真寺宰了十一头大牛，煮熟后，分五斤一块用毛头纸包好，便于抗日士兵每人一块路上食用。吉鸿昌见此情此景，不由落下泪来。他对送行的群众说：“乡亲们，不要送我们了。鸿昌不能在此保土安邦，怎么能再打扰你们。”说着，执意按每头牛二十元付款。

8 月 16 日，吉鸿昌将新部改称抗日讨贼军。

8 月 24 日，吉鸿昌出席中共河北前委在张北县二泉井村召开的扩大会议。会上成立了抗日同盟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吉鸿昌被选为常委。

吉鸿昌、方振武率部队沿热察边境到达北平十三陵、小汤山、高丽营一带，准备东进冀东，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这时正值潮白河暴涨，又遭到日蒋军的联合堵截，部队在小汤山、高丽营一带与敌人展开了战斗。当时中共北方局指示吉鸿昌寻机将部队带到冀南或者晋察边区建立新苏区。因而突破重重包围的小汤山战斗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战斗开始时，吉鸿昌亲自动员战士，敌人在我军步、骑、炮配合进攻下乘黄昏仓惶逃走，我军一举攻克小汤山。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部队虽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但在日蒋军队的重重包围、日军飞机轮番轰炸、敌军日夜不断的进攻中，吉部弹尽粮绝，终归失败。

八、“垂天之鹏，制于蝼蚁”

1933 年秋，吉鸿昌化装后秘密回到天津。为安全起见，他先住进了惠中饭店。随后，就悄悄地回到座落在法租界的家“红楼”中“隐居”。实际上是在党领导下继续从事开展抗日统一战线的活动，积极联络各地反蒋抗日力量，准备重新举起抗日救亡的大旗。

1934 年 1 月，吉鸿昌与宣侠父化装秘密赴沪，与上级党组织接上关系，向党组织汇报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抗日经过，并接受了新任务。从上海回津后，他革命的劲头更大了，他说：“从一个爱国者到一个共产主义者，这中间需要走过多长一段艰辛曲折的路程，可是每走一步又是多么地愉快

呵！”

在津的这段期间，吉鸿昌同宣侠父、南汉宸同志和任应岐将军等，组织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这个同盟的中央委员会，有冯玉祥、李济深、方振武、任应岐等各地反蒋抗日力量的代表。吉鸿昌被推选为中央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并是大同盟内的中共党团领导成员。

吉鸿昌还和宣侠父等创办《民族战旗》杂志，作为这个大同盟的机关刊物。他那座位于法租界花园一号的住宅，成了党组织的联络站。当时曾有不少党的负责同志，都在这幢有点神秘的红楼里头隐藏过、工作过。在三层楼的一角，还设有一个小小的秘密印刷所，油印一些秘密文件，同时也是《民族战旗》的编辑室。每期刊物的出版，都是一场紧张的战斗。吉鸿昌愉快地说：“我这人一辈子活得可真值得，工农兵学商五行我都占全了。”

但是，吉鸿昌潜回天津的消息，终于被法租界巡捕房所侦知。法租界当局首先在红楼门口安上了一个明岗，暗地里监视就更厉害。即便在半夜里，路静人稀的时候，还有便衣特务在附近盯梢。

吉鸿昌经常向在他住房附近站岗的巡捕做工作，讲些抗日救国的道理，巡捕也被感动了，有时还偷偷地报个信，叫他千万留神点儿。

3月，吉鸿昌与宣侠父等制定了中原暴动计划。吉鸿昌一面派人秘密与已进入江西苏区的两师旧部联系，加紧策反工作；一面着手准备在家乡河南发动暴动，与兵变后的部队结合起来，组成有十几万人参加的抗日义勇军，与杨虎城的部队联合，开辟西北抗日根据地。吉鸿昌还派人到南方联络方振武，请方振武北上；又派人到西安，通过王菊人与杨虎城联系，得到了杨虎城的全力支持。

与此同时，吉鸿昌还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在各地发展人民武装自卫军组织，并通过老关系联络了一批原西北军中具有反蒋抗日和爱国思想的旧军官，秘密将这些人召集到天津，由南汉宸、宣侠父及曾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李铁夫负责进行谈话、训练。然后，把他们分别派往西北各省，以及豫南、豫西、安徽等地，组织人民武装抗日自卫军，以配合中原暴动计划的实施。短短的几个月中，吉鸿昌重举武装抗日大旗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吉鸿昌的积极抗日活动引起了敌人更加密切的注意。吉鸿昌为了党组织及同志们安全，当机立断，改变了联络地点和方法，并秘密地把印刷所转往他处。他自己也改变了作风，整天到惠中、交通等大饭店以“访友”、“打牌”、“听戏”为名，与各地反蒋抗日人士联络。同时，他还派跟随自己多年的警卫副官牛建中，在北平鼓楼大街建立了一个秘密联络站，接待外地来京的抗日反蒋的代表。

一天傍晚，鸿昌回家后，便笑嘻嘻地对妻子说：“今天我可吓了那小子一跳。一出饭店，我就瞧见他跟着我。我故意到烟摊上去买东西，他就躲在那边装作看广告，一边用眼盯着我。我心里说，跟他开个玩笑吧。我就过去问他，‘喂，朋友，你干吗老跟着我呵？你每月挣多少钱呵？’吓得那小子扭头就跑了。”他还说：“那人是蓝衣社的。”

从这次以后，他更加留心了。惠中饭店不再去了，转移了阵地，在国民饭店开了一个房间，仍以打牌、会客作掩护，进行救亡工作。

相声演员张寿臣在平津一带很有名气。张寿臣富有爱国心，每次在剧场里说相声，在开头总要在垫话里以极愤慨的口吻说：

“国家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需要的是有血性的英雄。此刻我们英雄是有，可惜却无用武之地。就拿吉鸿昌来说吧，在察北抗日，杀得日寇胆战心寒，得到了辉煌的战果。我们应该要如何地鼓舞他，支援他，给我们民族出一口气。可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一意主和，希图消灭这一部分抗日的力量，致使吉将军事与愿违，抱恨回津。这种情形，我看是与南宋秦桧主和、陷害岳飞没有什么区别的……”

有一天，吉鸿昌专门去“听戏”，请张寿臣吃饭。吉鸿昌很亲热地对张说：

“人生得一知己，死也无悔。不想我戎马半生，竟在艺人当中，很荣幸地得到你这么个知己，实在佩服你的见识和胆量。不过处在这种暗无天日的时代里，我以朋友的立场来劝告你，希望你以后在台上说话要注意些。因为你跟我所处的环境不同，假如你为这个牺牲了性命，都没有地方诉冤去。我现在是朝不保夕，危险万分，说不定哪一天就要遭他们的暗算……”

过了两天，鸿昌派人给张寿臣送去两本宣传抗日救国的书。

那时，吉鸿昌的孩子还小：男孩兰泰，五岁；女儿瑞芝，三岁。鸿昌却很留心对孩子们的教育，常讲：“应让他们从小养成中国人的气节，在租界里长大的孩子不行。”他对孩子从小灌输爱国主义，时常摸着兰泰的头说：“咱们是中国人，不能受日本鬼子的欺负，一定要打倒他们。你们长大了，可一定要抗日啊！”每逢日本侵略者进占我国一处地方，他就问孩子：“日本鬼子杀到我们屋里头怎么办？”他还曾编几句话教兰泰学讲演：“我们是中国人。日本占领了中国许多地方，不应当受日本人的欺负。大家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8至9月间，派往安徽进行发动武装抗日工作的同志被捕，吉鸿昌在天津组织训练武装抗日力量的活动也相继暴露。蒋介石严令北平军分会不惜一切手段逮捕吉鸿昌，同时密令复兴社特务处暗杀吉鸿昌、南汉宸等人。

党组织获悉后，安排宣侠父立即离开天津去上海；南汉宸也转入地下，旋即离津赴沪。吉鸿昌则秘密地把家迁移到英租界牛津别墅（今和平区新华南路庆云里）。当时英租界有一巡捕头，与我党有联系，对吉鸿昌十分敬重，经常对他暗中保护，使国民党特务一时难下毒手。由于吉鸿昌与任应岐联系密切，与各地反蒋抗日力量代表会面，大部分又是通过任应岐联系，于是，敌人把目标集中在任的身上，企图一箭双雕。1934年11月，国民党军统天津站行动组长王文由北平来津策划刺杀事宜。一场罪恶的暗杀活动开始进行。由于国民党南京政府来电催问，军统北平站站长陈恭澍亲自由北平到天津，住在长春旅社指挥暗杀活动。

11月9日下午3时，鸿昌急匆匆地回家了。两只眼睛因熬夜红红的。妻子抱怨地说：“你这样搞工作，身子要搞坏啦。”他回答说：“现在还顾得上什么身体，你不是还有一万块钱的存款吗？快给我，我有急用。”妻子告诉他，再过几天，存款到期，就可从银行拿到一笔利息了，省得吃亏。他说：“搞革命，搞反蒋抗日，还能等十来天呵？这个时候，还管什么利钱不利钱？”当妻子说：“咱们的钱也得有个打算……”他不耐烦地说：“这钱是咱们的，可用在革命事业上比咱们自己花更有意义！”妻子连忙把存折给了他，他还向妻子要了点零钱，说是为了算清饭店的账，明天就不去饭店了，又拿了一身白裤褂，看了看孩子，连坐也没坐一下，就又走了。妻子追着他问：“工作联络得怎么样了？这样长了可不行呵！要出事的。”从来不吐露

工作情况的他，这次吐了个口风：“快了，你把家里收拾收拾，最近咱们要离开这儿了。”

当天晚上，吉鸿昌与任应岐借打牌为名，在法租界国民大饭店四十五号房内秘密同李宗仁的代表会谈。然而此时，国民党特务已跟踪而至。吉鸿昌秘密会谈的房门被推开，国民党特务开枪射击，李宗仁的代表刘某被当场打死，吉鸿昌与任应岐均身负枪伤。据当时报纸报道：“暴客二人，启门向刘开枪，刘当即倒地。旋向吉鸿昌射击，伤及臂部，伤势较轻，任应岐仅手部受微伤。”

敌人行刺后，仓皇逃走。随后，法租界工部局倾巢出动，以“杀人嫌疑”罪名将吉鸿昌等人逮捕，后送往老西开法国天主教堂后法国医院。

11月10日，法租界工部局审讯吉鸿昌，诱逼其供出天津地下党负责人名单及活动情况。吉鸿昌拍着胸脯说：“共产党员就我一个人，要杀要剐，都是我！”卑鄙无耻的敌人把他妻子抓进狱中，他冲着敌人破口大骂：“我是共产党，跟我妻子有什么相干？你们这群坏东西，真不要脸！”并高声喊道：“蒋介石杀得了我，杀不了广大人民，共产党员是杀不完的！”这时，他见妻子满脸泪痕，便安慰她说：“别伤心，人总有一死，这有什么！当然啰！军人应该一枪一炮死在抗日的战场上，这样才值得，死在他们手里可有点窝囊。”他嘱咐妻子好好教育孩子。他说：“我们的后代一定会比我们更有出息，我们没有做到的事情要靠他们来做。”他还再三叮咛妻子不必营救：“营救也没有用处，这件事我心里清亮得很，他们早想要我的脑袋，这一下得到了就不会放掉。你不必为我过分悲伤，你也知道我是为什么牺牲的！”

不久，吉夫人被放出来。她到处奔走营救吉鸿昌。中共天津地下党组织也积极活动，营救吉鸿昌。就在这个时候，吉夫人接连收到鸿昌新写的两个字条。一个写的是：“垂天之鹏，制于蝼蚁”。另一个写：“转入宪兵司令部，凶多吉少。不要难过，此为老百姓。”

原来，吉鸿昌被捕消息被报纸披露后，蒋介石十分惊恐，当即派军统局郑介民来津，与法租界当局秘密协商引渡吉鸿昌。在花了一笔巨款以后，11月14日，吉鸿昌、任应岐等被工部局以“通缉在案”为由引渡给国民党天津市公安局审讯。后被押往国民党第51军军法处，连续受审。据报载：他们被引渡“到公安局后，由第三科提讯，吉倔强蛮骂。”鸿昌在第51军军部“遇有提讯时，态度倔强，骂不绝口。”随后，吉鸿昌等被关进蔡家花园陆军监狱。

吉鸿昌深知蒋介石决不会轻易放过自己，他几次要求党组织停止营救行动，以避免无谓损失。

九、“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吉鸿昌在天津陆军监狱被囚禁了九天。1934年11月22日，被武装军警严密押解至北平军分会军法处。当时，何应钦派人将一份印有“立时处决”的电报给他看。吉鸿昌看后轻蔑地说：“行呵！你们什么时候动手呵？”

北平军分会由何应钦主持，23日，北京军分会组织“军法会审”。

何应钦：“吉鸿昌！你为什么进行抗日活动？快招出你的秘密来！”

吉鸿昌：“抗日是为了救国，这是四万万人民的事情，是最光明磊落的事情，有什么秘密？抗日救国是中国人民人人应知，人人能知的事情，哪里

会有秘密？只有蒋介石和你们这班狗奴才，祸国殃民，残内媚外，和日本暗中勾结，干些不明不白的勾当，这才有秘密，才见不得人。”

吉鸿昌说到兴奋处，将上衣解开，袒露出累累伤痕，说：“看！这就是我仅有的一点‘秘密’，是你们军队勾结日本鬼子留给我的‘纪念’！”

在这次“会审”中，吉鸿昌受了酷刑。当时执刑的一些士兵，后来也说：从来没瞧过这么硬的汉子，除了骂，他没有叫过一句苦，喊过一声痛。

鸿昌带着满身刑伤回到狱中。他对难友们说：“我就要和大家分手了，我要在死以前，把抗日的道理再和你们讲讲，……”他还讲他为什么参加共产党，嗓子都讲哑了，听的人感动得哭了。他劝大家别哭，留下力量打日本鬼子去。后来，他把怀里的金表拿出来，叫典狱长卖了，给大家添点菜吃。他说：“你们一定要保重身体，出了狱就可以去抗日！”

在他殉难的前一天夜里，鸿昌还在宣传抗日，有人劝他休息一下，他说：“我要永远休息了，你让我多宣传几句吧！”

11月24日，是吉鸿昌殉难的日子。在就义前几小时，他要了笔墨和信纸，先写了一封革命遗书，写了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经历，历数了国民党蒋介石的罪行。这封遗书随即被特务送到何应钦手里，他看后一屁股倒在沙发上，脸色发青，双手直抖，把信扔在了火炉里。吉鸿昌还分别给妻子、兄弟和朋友写了遗嘱。给妻子的遗嘱中写道：“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他再三叮嘱要好好教育孩子，“以成有用之材”。

24日13时30分，吉鸿昌大踏步走向陆军东场院刑场，面对敌人的屠刀，他“态度从容，谈笑自若”，用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写上了浩气正气的就义诗：

恨不抗日死，
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
我何惜此头！

然后起身对执刑的刽子手厉声说：“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给我拿个椅子来，我得坐着死。”“我为抗日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后挨枪。”“你在我眼前开枪，我要亲眼看到敌人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然后高呼：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革命万岁！”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共产党员、民族英雄吉鸿昌英勇就义时，仅三十九岁。当时的许多报纸敬佩地称道他是“至死不屈”、“吉神色自若”、“这位愤懑不平的将军就义的时候态度从容。”

吉鸿昌就义后，党组织派人及时找到烈士的家属，转达了对吉鸿昌壮烈牺牲的哀悼，指出：“鸿昌同志死得这么英雄，这么勇敢，真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我们党的杰出战士。他的精神永垂不朽，他所献身的革命事业一定能够胜利。因为他是为真理而光荣牺牲，他全力以赴的斗争是正义的。中国人民决不会忘记他，党也会永远怀念他的。”

1945年党的“七大”时，党中央决定授予吉鸿昌革命烈士称号。

1951年，人民政府把印有毛泽东主席亲笔题词的“永垂不朽”的光荣烈属证书授予烈士的妻子胡洪霞。

1971年，周恩来在国务院召开的一次会上指出：“吉鸿昌同志由旧军人出身，后来参加了共产党，牺牲时很英勇，从容就义。很有必要把他的事迹出书。”

1979年4月5日，吉鸿昌烈士纪念馆在河南省扶沟县落成。

1984年，在吉鸿昌烈士就义50周年前夕，邓小平亲笔为《吉鸿昌将军牺牲五十周年纪念辑》题了书名，聂荣臻、薄一波也亲笔为纪念碑题名、题词。

吉鸿昌的气节和精神永存！

